

 南开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青年学者文库

BAUDELAIRE ET LA REVOLUTION

CULTURELLE CHINOISE

波德莱尔与“前朦胧诗”写作

杨玉平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青年学者文库

波德莱尔与“前朦胧诗”写作

杨玉平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德莱尔与“前朦胧诗”写作 / 杨玉平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8.6

(南开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310-05601-9

I. ①波… II. ①杨… III. ①波德莱尔(
Baudelaire, Charles 1821—1867)—诗歌研究 IV.
①I56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1804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运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2 插页

185 千字

定价:3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目 录

引 言	1
1. “前朦胧诗”与西方文学	2
2. “前朦胧诗”与波德莱尔	4
第一章 1957 年的“波德莱尔专刊”	9
1. 译介《恶之花》	9
2. 戴望舒的翻译	31
第二章 “X 诗社”与波德莱尔	35
1. “X 诗社”的写作	36
2. 郭世英、张鹤慈的诗歌创作与波德莱尔	38
3. 现代艺术的先锋	49
第三章 北京—白洋淀诗群与波德莱尔	51
1. 北京—白洋淀的地下读书运动	51
2. 北京—白洋淀的“前朦胧诗”写作	57
3. “内部发行图书”中的波德莱尔	59
4. 食指	61
5. 食指之后的诗	77
第四章 白洋淀“三剑客”	81
1. 芒克	81
2. 根子	88
3. 多多	99
4. 各具特色的“三剑客”	135

第五章 北岛	137
1. 诗与生活	138
2. 应和与象征	140
3. 诗人与苦难	144
4. 孤独	152
5. “波德莱尔的影子无处不在”	155
第六章 南方诗人与波德莱尔	156
1. 朱育琳与波德莱尔	157
2. 陈建华与波德莱尔	170
3. 钱玉林与波德莱尔	196
4. 哑默与波德莱尔	203
5. 颓废文化的继承者	206
结 论	208
参考文献	218

引言

我们在路上偷来暗藏的快乐，
把它用力压挤得像只干了的橙子。

——波德莱尔《致读者》
《恶之花》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朦胧诗”在当代文坛横空出世，在经历了一场激烈论争后，迅速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新诗潮。如今，“朦胧诗”已被当代文学史经典化。然而，围绕“朦胧诗”研究尚有不少疑问。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朦胧诗”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文学开始全面复苏的年代，但“朦胧诗”的很多干将早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就着手写作，不少“朦胧诗”作品实际诞生于这一时期。从写作内容来看，“朦胧诗”当年之所以引起激烈争论，不外乎它的写作中包含的现代主义因素，使“朦胧诗”与当时主流诗坛的作品显得大相径庭，扰乱了某些批评家和读者的阅读习惯。然而，现代主义因素早在“朦胧诗”之前的诗歌写作中就出现了。因此，“朦胧诗”绝不是无源之水，这股奔涌而出的诗潮是许多已知和未知的文学潜流汇聚而成的。已经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将始于“朦胧诗”之前并且与“朦胧诗”具有历史和艺术关联的诗歌写作统称为“前朦胧诗”。

与“朦胧诗”相比，“前朦胧诗”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前朦胧诗”写作目前可以上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但它的起始时间尚不明确，这是一段精彩但仍须探索的历史。其次，“前朦胧诗”

的作者范围非常广泛，内容十分丰富。由于“前朦胧诗”写作主要发生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此往往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出现。根据已知材料，具有现代主义因素的“前朦胧诗”写作在全国各地都曾经存在，而且各具特色。另外，“前朦胧诗”总体上是一种缺乏明确文学目标的写作，作者的水平和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没有统一的理论和宗旨，创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很多作品没有保存下来。尽管如此，研究“前朦胧诗”写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朦胧诗”与“前朦胧诗”之间的历史和艺术关联，更好地理解“朦胧诗”的各种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同时，“前朦胧诗”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于认识整个当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前朦胧诗”写作受到很多文学资源的影响，例如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当时的红色主流文学、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但“前朦胧诗”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它展现的现代主义因素，而现代主义是源于西方的一种文化思潮。那么，“前朦胧诗”写作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1. “前朦胧诗”与西方文学

前面已经提到，“前朦胧诗”写作拥有庞大的创作群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写作？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普遍缺乏文化娱乐的情况下，文学不失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在《1966—1976 的地下文学》一书中，杨健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禁锢和缺乏文化娱乐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广泛的自发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①。但除此之外，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2010 年 6 月，高

^① 杨健：《1966—1976 的地下文学》，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 页。

行健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讲座中谈及自己青年时代，即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写作时说，“写作是一种需要”。高行健的说法代表了很多作者的情况。“前朦胧诗”写作的主力是知青。规模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使他们离开熟悉的城市，来到贫困的乡村。残酷的现实使许多人褪去理想的狂热，陷入深深的迷失。北岛虽然留在城市，但建筑工人的经历让他有机会了解底层民众的苦难。在一次访谈中，北岛提到当时的心理状态：“中国底层的现实远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我们的迷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① 为了抵抗缠绕他们的迷失，一代青年开始转向阅读，并通过写作来记录心灵的困惑和思考的历程。渐渐地，写作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在《隐居的时代》中，王安忆描绘了知青们写作的狂热状态：

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伪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路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②

这段文字道出了知青写作的原因。写作为身处困境的生命赋予了存在的尊严和意义。他们在写作中倾泻着被现实压抑的情感，寄托了对生活的梦想。王安忆还道出了另一个事实，即知青写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尽管王安忆只提到俄国文学，但事实上知青们的阅读范围极广，其中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占了很大一部分。而

①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第 69 页。

② 王安忆：《隐居的时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 436 页。

这一点与 1949 年以后执行的文艺政策不无关系。一批无法跟上新形势、扮演新角色的作家被迫中断创作，为了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幸存下去，很多人转向文学研究或文学翻译，如“九叶派”诗人袁可嘉和穆旦。因此，当代文学在这一阶段，虽然损失了一批作家，却迎来了一批翻译家，使一个时代的写作注定与翻译结缘。

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具有异端性质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青年手中。尽管数量有限，却为他们敞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从开始的阅读、欣赏，很快就过渡到了具有模仿和实验性质的写作，而诗歌成了他们写作的主要形式。从他们的作品来看，西方现代文学最吸引他们的，除了光怪陆离的美学观念和创作手法之外，就是西方诗人对现代社会人性迷失的思考。尽管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中国社会却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了这个问题，并且暗暗折磨着所有追求真理的心。在红色主流文学中消失的个体的价值，以或明或暗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一代青年的写作之中。北京、白洋淀、贵阳、上海、重庆，乃至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艺沙龙，聚集了西方现代诗歌狂热的爱好者，其中包括很多后来享誉当代诗坛的诗人，如食指、芒克、根子、多多、北岛、哑默。他们都是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开始写作的，而且全都承认西方现代诗歌对自己的影响。引人注目的是，在他们列出的外国诗人的名单中，几乎每个人都提到波德莱尔。不止一位诗人宣称，他们是读了《恶之花》后才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而他们的写作也的确带着波德莱尔的痕迹。波德莱尔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2. “前朦胧诗”与波德莱尔

自 20 世纪 20 年代波德莱尔的诗歌被介绍到国内以来，这位

法国诗人赢得了无数中国作家和读者的青睐。很多研究已经证实了波德莱尔与中国现代诗歌的深厚渊源，但波德莱尔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关系，尤其是与“前朦胧诗”写作的关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波德莱尔在现代中国曾风光无限，1949年以后却备受冷遇。如果仔细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天壤之别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文学接受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波德莱尔“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产生冲突；他的颓废、对人类命运不可救药的绝望则与共产主义弘扬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人生态度背道而驰；象征主义的写作方式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更是毫不沾边。然而，历史之手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再次塑造了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命运。1957年，为响应“双百”方针的号召，当时负责介绍外国文学的唯一杂志《译文》发行了一期波德莱尔专刊，以此纪念《恶之花》初版一百周年。尽管这期《译文》只发表了两篇介绍波德莱尔的批评文章和九首选自《恶之花》的译诗，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波德莱尔在青年读者中激起了不可思议的热情。好几位当代诗人提到过这期《译文》。北岛在谈到波德莱尔和北京地下诗歌写作的关系时说：

陈敬容是我所敬佩的九叶派诗人之一。她译的波德莱尔的九首诗散见于50、60年代的《世界文学》^①，被我们大海捞针般搜罗在一起，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那几首诗的翻译，对发端于60年代末的北京地下文坛的精神指导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②

① 当时还叫《译文》。

② 北岛：《时间的玫瑰》，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20 世纪 20、30 年代是中国大力译介西方现代文学的时期，很多诗人和作家研究、介绍或选译过《恶之花》。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除了 1957 年《译文》的“波德莱尔专刊”，尽管比较困难，读者应该还能找到《恶之花》的其他译本。例如戴望舒 1947 年发表的《恶之花掇英》，这本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的《恶之花》选译本收集了 24 首波德莱尔的诗。此外，商务印书馆于 1971 年出版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一书。这本书中有一篇介绍波德莱尔的文章，还有几首译自《恶之花》的诗或诗歌片段。这三种材料与波德莱尔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中国的命运都有关联，尤其是 1957 年的《译文》专刊，因为这期专刊是 1949 年以后第一次大规模地介绍波德莱尔的艺术。需要探讨的是：在时代特有的意识形态下，《恶之花》为什么能得到一次如此难得的绽放机会？波德莱尔的诗歌是如何被解读的？青年诗人们阅读的外国作家不止波德莱尔一人，为什么偏偏是恶魔诗人对他们产生了无法抗拒的魅力？他们在《恶之花》中找到了什么？波德莱尔在哪些方面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刺激了他们的诗歌想象？《恶之花》对他们的写作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深？他们与波德莱尔的精神契合与艺术契合是怎样实现的？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波德莱尔在中国各地都拥有众多读者，对全国的“前朦胧诗”写作均产生了影响，但本书将集中研究北京（白洋淀）地区和上海地区的“前朦胧诗”写作，为上述问题找到答案。这样做的原因如下：首先，北京和上海是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人文荟萃，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其次，这两个地区诞生了中国当代诗坛最重要的几位诗人，他们的写作历程可以生动地向我们展示那个时代青年写作者的文学追求，以及像波德莱尔这样一位外国诗人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写作的。另外，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也主要是关于这两个地区的“前朦胧诗”

写作。

由于“前朦胧诗”主要以地下写作的方式呈现，因此，与研究正常写作相比，研究“前朦胧诗”写作会遇到不少困难。首先，如何甄别材料。本书主要依据国内几部有关“前朦胧诗”写作和“潜在写作”的专著来获取资料，并确定要研究的诗人：杨健的《1966—1976 的地下文学》、刘禾的《持灯的使者》和刘志荣的《潜在写作（1949—1976）》。至于具体作品，本书只选择那些创作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包括个别创作于 80 年代初，并且目前已经出版的文字。有时，一首诗可能会有几个版本，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前朦胧诗”写作的原始状态，本书一般选取最早出版的版本。在这方面，陈思和主编的《潜在写作文丛》（我们将参考该文丛的诗歌部分，即编者李润霞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潜在诗选，包括《暗夜的举火者》（上卷）、《青春的绝响》（中卷）、《被放逐的诗神》（下卷））和北岛创建的文学网站“今天”为我们保留了值得信赖的“原创”。另外，本书也不忽视其他相关资料，例如关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的历史和“前朦胧诗”写作的众多著作、文章和访谈。

本书将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证主义方法，研究波德莱尔对“前朦胧诗”写作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本书将提出更多有关这一影响引发的问题。“前朦胧诗”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标语口号化、意识形态化的主流文学的反叛。僵硬的程式化语言使红色主流文学逐渐丧失了活力，因此“前朦胧诗”写作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诗歌语言，摆脱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垄断，恢复文学的独立和尊严。这是“前朦胧诗”写作面临的任务，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怎样摆脱旧语言的羁绊，创建新语言？新语言是一种怎样的语言？是一种以个体化特征来替换集体化特征的语言吗？新的诗歌语言如何处理与旧的诗歌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它是对西方现代诗歌语言纯粹的模仿，还是在完成对西

方现代诗歌语言的消化吸收后，孵化出的一种新的符合中国语言特点的诗歌语言？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波德莱尔的诗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总之，本书的根本目的就是揭示波德莱尔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创建了“前朦胧诗”的语言，从广义的角度讲，波德莱尔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创建了中国当代文学。

第一章 1957 年的“波德莱尔专刊”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文学逐渐传入我国。诗歌因其简短的形式，成为作家们实践文学改良的最佳实验手段。因此，作家兼译者们往往对诗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在西方诗歌那里，为正在寻求新形式、创造新形象的中国诗歌找到理想的借鉴。法国诗歌从一开始就被中国作家视为新颖与现代的典型。波德莱尔、果尔蒙、雨果、拉马丁、缪塞、瓦雷里、魏尔伦的诗歌纷纷被翻译和出版。波德莱尔虽然不是第一个作品被译成中文的法国诗人，但他的作品因其精美的语言、独特的修辞、奇谲的主题和大胆的美学思想，得到了中国诗人、译者和批评家的赞赏，被视为现代主义的鼻祖、象征主义的宗师，是 1949 年前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法国诗人。中国象征派诗人或现代派诗人的成长历程都或多或少显示出《恶之花》的痕迹。当时，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作家们享有广泛的自由。尽管围绕波德莱尔发生过论战，但从总体上讲，波德莱尔的接受与意识形态关联不大。

1. 译介《恶之花》

1949 年后，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日渐紧密，也影响到翻译文学的取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被视为代表着人类进步创作倾向的文学，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学习的榜样，自然成为译介的主要对象。而东西方政治对峙使西方文学在中国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对西方文学的译介集中在 20 世纪以前的古典作品，而且主要是“现实主义”作品。至于 20 世纪文学，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作家、“进步”作家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才有资格被译介过来。1949 年前备受青睐的西方现代派遭到冷遇。

波德莱尔的命运与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作为颓废诗人的代表，波德莱尔失去了市场。1949 年，茅盾在批判某些作家和读者盲目崇拜西方文学时，就点了波德莱尔的名：“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波特莱耳也成为值得学习的模范。”^① 在《夜读偶记》中，茅盾提及波德莱尔时虽未完全否定，但还是说：“像波特莱尔那样的被称为颓废主义的作家和作品（连同他的创作方法）……”^② 既然波德莱尔的名声总是与颓废文学捆绑在一起，那么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是如何解读颓废文学的？茅盾批判现代派的文字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认识：

“现代派”诸家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只问怎样表现，不管表现什么”，这句话正说明了“现代派”这个特点。然而，他们的不要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的作品，依然表示了他们对于现实的看法，对于生活的态度。而这一种看法和态度是像鸦片一样有毒的。这种看法和态度，早已有一个名称，叫做“颓废”。^③

青年时代的茅盾曾是象征主义的崇拜者，现在却毫不留情地批判这一文学潮流：

文学上的象征派是悲观主义者，又是神秘论者……象征

①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年，第 1249 页。

② 茅盾：《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56 页。

③ 同上，第 176-177 页。

派反映了“世纪末情绪”……它是以一个对未来没有信心、对现在失却兴趣的厌世者或遁世者的潦倒颓唐面目出现在我们跟前的；^①

在这种情况下，波德莱尔的作品在中国似乎已没有未来。但 1956 年推出的“双百”方针使情势出现转机。文学界经过对 1949 年以来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反思，呼吁打破译介苏联文学的单一模式，加强与西方文学的联系，译介更多的西方文学作品。读者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拓宽阅读范围、了解西方文学的强烈愿望。此时的《译文》杂志逐渐表现出较为开放的姿态，不再只青睐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开始重新关注包括现代派在内的西方文学。1957 年 7 月，为纪念《恶之花》初版百年，《译文》推出了“波德莱尔专刊”，对波德莱尔及其作品做了较全面的介绍。“专刊”包括一帧波德莱尔版画像、《恶之花》初版里封面（波德莱尔亲自校订的校样）、《译文》编者按，还有时任《译文》编辑的诗入陈敬容从《恶之花》中选译的九首诗、法共作家阿拉贡 1957 年 3 月为纪念波德莱尔发表于《法兰西文学报》上的文章（译者是沈宝基）和苏联翻译家列维克关于波德莱尔的评论（译者是何如）。

1.1 《译文》的编者按

1957 年的“专刊”显示了《译文》编辑部对待波德莱尔的态度。“编者按”开头就对《恶之花》展开了新的诠释：

“恶之花”（Fleurs du Mal），按照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本意，是指“病态的花”。原书的里封面上印

^① 茅盾：《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78 页。

有一句题辞：“……，将这些病态的花献给……”我国过去一向译成“恶之花”，这“恶”字本应当包含丑恶与罪恶两个方面，然而却往往被理解为罪恶或恶毒，引申下去，恶之花就被当成了毒花、毒草甚至毒药了。^①

当时，文艺界惯以“香花”或“毒草”来比喻文学作品，定义它们的文学价值。《译文》不避嫌疑，否认《恶之花》是毒草，通过重新诠释的角度来肯定波德莱尔的文学价值。“编者按”随后简要介绍了《恶之花》和诗集几次出版的情况。在提到1857年《恶之花》初版遭遇的诉讼时，“编者按”把发表布尔丹攻击波德莱尔的文章的《费加罗报》称为“一个反动报纸”^②，认为诉讼是法国政府的一个阴谋。“编者按”将波德莱尔的生活描述得十分不幸：

6岁时父亲死去，母亲改嫁了一个陆军中校，这中校对他很不好，他很爱母亲，也就分外憎恶和嫉妒这个继父，弄得一度神经失常。这不幸遭遇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一生穷愁潦倒。^③

为了说明波德莱尔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诗人，“编者按”特意指出波德莱尔于“1848年2月和两个朋友合办了一个革命性的日报《公共安全》”。^④编者按还极力证明波德莱尔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颓废诗人：“波特莱尔的生活虽然散漫，但他工作起来却非常紧张。他的诗作里一再出现‘劳动’这个词儿，这在他并不只是抽象的东西。”^⑤

①〔法〕波特莱尔：《恶之花》（选译），编者按，《译文》，1957年第7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